

THE PRIVATE
DISCOURSES
OF MA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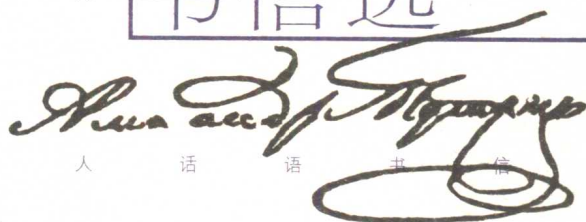
俄罗斯的夜莺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主编：金惠敏

张铁夫 译

普希金 书信选



作家出版社

大师私人话语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普希金

THE PRIVATE
.....
DISCOURSES
.....
OF MASTER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俄罗斯的夜莺

普希金书信选

张铁夫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的夜莺：普希金书信选 / (俄) 普希金著；张铁夫译.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1

(大师私人话语)

ISBN 7-80127-786-4

I. 俄... II ①. 普... ②张... III. 书信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1382 号

著 者	(俄) 普希金
译 者	张铁夫
责任编辑	齐 平 文 非
责任校对	王晓丽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 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00 千字
插 图	86 幅
版 次	2001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2.5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127-786-4/1.83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金惠敏

从来就有一个私语的世界，只要您认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私人性与社会性永远相反而相成。

然而由于传统的宏大叙述的霸权，这一世界尚未充分展露，这种话语尚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今天，该是打破宏大叙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无论从哪方面说，私人话语都具有与公众话语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私人话语甚至更具决定性或优先性。

例如，如果把阅读和批评作为对另一个心灵的探问，与它碰撞、对话、交流，那么可能没有比通过书信（包括日记）这类被宏大叙述视为次文本更捷径的方式了。在所谓的正文本即通常所称的作品中，原作者之意盖不在表现，而在表演，即是说，在伪装自己，至少不是在直接地表现自己。如俄国形式主义所发现的，“文学性即是陌生化”，即以造成某种接受障碍为美、为艺术或学术。现代主义大诗人艾略特因而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面对公众读者，作者总是代表“理性”、“良知”、“社会责任”在说话；他总是把自己作为对象，耿耿于怎样给公众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在书

信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面对的是亲朋好友，作者卸下了
一切社会性面具，轻松随意地袒露出自己的本真面目。他是纯
粹的主体，专注于倾诉，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件有待完成的艺
术品。这里不需要精雕细刻、深思熟虑。

德国生命哲学家齐美尔断言：“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
的。”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划分为意识与
潜意识。这里如果把作者的正文本比作意识，那么其次文本即
书信等则是潜意识。而潜意识是水面下的冰山，要比显露出来
的那部分巨大得多。要深入一个心灵的世界，仅知其正文本最
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只有同时了解了他的次文本，才
可能真正地把握这位作者。因此，美国现象学批评家有理由认
为，对于游历一位伟大的心灵来说，书信、日记、便条、眉
批、笔记等的作用决不亚于其刻意创作出来的作品。

通过这一书系，我们试图证明书信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是
抒情的、亲切的美文；它是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
自然袒露；它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简言
之，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种与公众性阅读相辉映的私密性阅
读。

为方便查阅，丛书在每封信前都加有提示性标题，或为作
者原话，或为编/译者的概括。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一要感谢译者诸君对私人话语理念的

热忱，二是薛晓源先生别出心裁的策划，还有胡子清女士高明而娴熟的编辑。

相信我们共同的努力将给读者带来某些新鲜的感受。

是为序。

2000年10月20日

译者序

张铁夫

在普希金丰富的文学遗产中，书信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苏联曾经出版过普氏的多种书信集。科学院版 16 卷本《普希金全集》（1937~1949 年）收录的书信达 4 卷之多（含写给普氏的信）；国家文艺出版社版 10 卷本《普希金文集》（1959~1962 年）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收录普氏所写的信，共 786 封，此外，还有少量公函。第一封是 1815 年 11 月 28 日写给国民教育司司长伊·伊·马尔蒂诺夫的，最后一封是 1837 年 1 月 27 日，即与丹特士决斗当天上午写的，收信人是女作家亚·奥·伊希莫娃，这是他的绝笔信。毋庸置疑，普氏生前所写的信远远超出上述数字。由于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大量书信或被销毁，或流失异乡。据前苏联学者伊·谢明科说，10 卷本所收的书信是所能提供的全部书信。^①

书信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和小普林尼不仅以写演说辞著称，而且在书信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① 伊·谢明科：《普希金的书信》，见《普希金文集》第九卷，国家文艺出版社，莫斯科，1962 年，第 406 页。

他们的不少书信成为古代散文的经典。在俄国，16 世纪最珍贵的文献便是《伊凡雷帝与库尔布斯基通信集》。尽管两人往还书信只有 6 封（伊凡雷帝两封，库尔布斯基 4 封），但它却是俄罗斯在摆脱蒙古人统治之后，在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过程中最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到了 18 世纪，随着感伤主义文学的兴起，书信体小说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种文体被称为“特殊的方式”。理查逊的《帕美拉》、《克拉丽莎》，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就是这种文体的代表作。普希金显然受到上述两人的影响，我们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关于女主人公达吉雅娜读书生活的描写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小说从很早她就迷恋；
取代了她心中的一切东西；
理查逊的小说她喜欢看，
卢梭的小说她也欢喜。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和 30 年代，普希金本人也用书信体写过两部小说——《书信体小说》（1829）和《马利亚·绍宁》（1835）。不过二者均未完成：前者只有 10 封信，后者只有 3 封信。对普希金来说，书信体小说显然远不如书信那么得心应手，因此他留下的书信体小说始终只有两部残稿，而留下的书

信却是大量的。

安德烈·莫洛亚在《拜伦书信选·绪言》中说：“书信的作者可以说有这样三种：一种是借助书信来披露思想的；一种是无病呻吟、把十分单调的生活中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借重形式来装饰各种事情；最后一种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信并把他们的整个炽烈而充满活力的身心都倾注到通信中去的人。虽然在最伟大的书信作者中存在着集这三者于一身的通信人，不过我们可以说泰恩属于第一种，塞维尼夫人属于第二种；拜伦则属于第三种。……拜伦写信决不是为了产生一种文学效果。他写信是为了传递信息、表达明白而确定的感情；他写信措词十分准确，这是没有艺术的艺术，是艺术的极致。”^①

同拜伦一样，普希金写信也是为了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而不是为了产生“文学效果”；同拜伦一样，他也是一个把“整个炽热而充满活力的身心都倾注到通信中去的人”。

普希金的一生是色彩斑斓的，因而他的书信也是多主题的。它们从方方面面反映了他的思想、生活和创作，有如一部用书信组成的自传。

① 见《拜伦书信选》，王昕若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政治书简是普氏书信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普希金不是政治家，甚至也算不上政府官员。早年，他名义上是外交部的一名十等文官，但却根本不去部里上班；被放逐到南方之后，他的编制仍在外交部，700卢布的薪俸照领不误，但他把这笔钱视为政府对他因流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所作的补偿，用他的话来说，“我领取这700卢布不是作为一个官员的薪俸，而是作为一个流刑犯的口粮。”（1824年5月24日致亚·伊·卡兹纳切耶夫的信）因此，他不从事任何公务活动。在敖德萨期间，沃龙佐夫总督派他去蝗灾地区做过一次调查，他在灾区走马观花地转了一趟，回来后用一首打油诗交差了事。后期，尼古拉一世出于某种目的任命他为宫廷侍从，普希金把它视为奇耻大辱，连王储的成年庆祝活动都称病在家，有意躲避，更不用说一般公务活动了。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说明普希金与政治无关，恰恰相反，他的一生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知道，普希金在学生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外交部供职期间，他经常参加十二月党人组织“幸福同盟”领导者之一屠格涅夫的小组和“幸福同盟”分会“绿灯社”的活动。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主要反映在《乡村》、《自由颂》、《致恰阿达耶夫》等诗中。除了1819年10月27日致帕·波·曼苏洛夫的信中出现“绿灯燃尽了——似乎要熄灭了”，“我爱你——也憎恨专制”等语外，在书信中没有更多的反映。

到南方后，他同十二月党人米·奥尔洛夫、弗·拉耶夫斯基和希腊“秘密联盟”领导者——“独臂公爵”亚历山大·伊普西兰季等人过从甚密，并且会见过“南社”领导人佩斯杰尔中校。他虽然没有参加秘密组织，但秘密组织的成员并没有把他当作外人，常常吸收他参加讨论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会议。他与十二月党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一致的。《短剑》、《囚徒》、《忠诚的希腊女儿呀，不要哭……》、《致雅·尼·托尔斯泰函摘抄》等抒情诗便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怀念和向往，而同一时期的书信则可以说是不分行的自由的颂歌。例如1822年9月，他从基希尼奥夫写给“绿灯社”成员雅·尼·托尔斯泰的信就对“我们那些人”——“绿灯社”的朋友们充满怀念之情。信中还插入了一首诗（即上文提到的《致雅·尼·托尔斯泰函摘抄》），第一句便是“你还在闪耀吗，我们的明灯”。诗中回忆了“友谊的幸福”、“思想的闪光”、“激烈的争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处于“孤寂的流放中”的诗人对自由的伙伴们的羡慕和思念。又如1821年3月致瓦·里·达维多夫（？）的信，作者满怀激情地欢呼：“希腊起义了，宣布自由了。”然后详细地描述了伊普西兰季领导的起义的经过——他如何从基希尼奥夫来到雅西，如何接任总指挥职务，希腊人如何聚集到他那写有“旗开得胜”字样和画着新生的凤凰的几面旗帜之下，以及一位武装起义者在信中所描绘的伊普西兰季公爵的旗与剑

的神圣仪式……

同自由思想一样，无神论思想在当时也是大逆不道的。应该说，普希金的宗教观是比较复杂的。以前，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绝对化，把他说成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其实，只要认真地读一读他的作品，便可发现，普希金也信上帝，他的创作中渗透着基督教精神。当然，从总的倾向来说，他是反宗教的。早年他曾写过两首反宗教的长诗——《巴尔科夫的幽灵》和《加百列颂》，使他后来陷入了一场政治官司，而一封反宗教的信，则直接导致了他的第二次流放。这是1824年四五月间的事，他在从教德萨写给丘赫尔别凯（？）的信中提到了沃龙佐夫总督的医生威廉·哈特琴逊博士，说自己在“学习纯无神论课程”，称赞威廉·哈特琴逊博士是“我所见过的惟一聪明的无神论者”，他的手稿“把灵魂不朽的那些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都摧毁了”，他的体系“极其真实”。这封信被警方截获。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旨意，当局以行为不端为由将普希金从外交部除名，并决定将他押送至普斯科夫省他母亲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监管。

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普希金谨言慎行。当局曾派人下乡对他的言行进行调查，却一无所获。事实上，从这时起直到逝世，普希金的思想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仍然忠于十二月党人的理想，对现实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与政

府和解，而在波兰问题上则完全站在政府一边。这在他的后期创作和后期书信中都有所反映。

在普希金的书信中，文学书简占有很大的比重。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书简，只有少数是纯文学性的，而多数仅仅是涉及到文学问题罢了。在他的收信人中，包括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如格涅吉奇、维亚泽姆斯基、戴尔维格、茹科夫斯基、丘赫尔别凯、雷列耶夫、亚·亚·别斯土舍夫、普列特尼奥夫、扎戈斯金、波果津、果戈理、伊·伊·德米特里耶夫等人。

阅读普希金的文学书简，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诗人。他认为，对学术和文艺的庇护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应当是气度高尚、独立不倚的。当时，进步作家常常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迫害，普希金总是与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823年2月6日，他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说：“感谢你使书刊检查机关碰了一个钉子，但它却连这都不配：令人羞愧的是，人民中一个最高贵的阶层，一个富于思想的阶层，不管怎样，却常常遭到一个胆小的傻瓜的肆意迫害。我们往往付诸一笑，不过最好是把比鲁科夫们狠狠地教训一顿。现在是让我们的意见受到重视和迫使政府尊重我们的发言权的时候了——对俄国作家的蔑视是不能容忍的。”同年11月4日，他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又说：“不要向检查机关这条狗让

步，要为每一行诗咬它，如有可能，就把它咬死……”在创作问题上，即使是面对他的最高检查官尼古拉一世，他也是寸步不让。尼古拉一世读了普希金的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后，对其中一些地方很不满意，要他进行修改。1827年1月3日，普希金在给宪兵头子和第三厅厅长卡肯多尔夫的信中说：“我承认，诚如皇帝陛下所指出的，它与其说像一部悲剧，不如说像一部历史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的作品一经写成，就再也不能修改。”

作为一位批评家，普希金对别人的作品是既宽容又严厉的。如果他认为作品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他就会对该作品予以肯定，对扎戈斯金的长篇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和波果津的悲剧《玛尔法女市长》的态度就是如此。反之，如果他认为作品的主要方面是不成功的，不管作者是谁，他就会对该作品进行严厉的批评。雷列耶夫与普希金是志同道合的朋友。1825年1月11日，普欣去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看望普希金时，曾给他捎去雷列耶夫的一封信。他对普希金以“你”相称，并对《茨冈人》表示祝贺。信中说：“它（指《茨冈人》——引者）完全证明，我们认为你具有才华的观点是正确的。你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迈进，使真正的俄罗斯心灵感到欣

喜。”^①普希金在14天后便给雷列耶夫回了一信，对他的来信和以“你”相称表示感谢。可是在同年5月的一封信中，普希金却对雷列耶夫的组诗《沉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写道：“然而总的说来，它们在构思和叙述方面都很差劲。千篇一律，全是老生常谈（Loci topici）。对情节发生地点的描写、人物的语言都是训诫性的。除了名字以外，里面没有任何民族的、俄罗斯的东西（《伊凡·苏萨宁》除外，这是我在你身上开始发现真正天才的第一篇《沉思》）。”在这里，普希金不仅是批评了一部具体的作品，而且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后来他在书信和评论中多次作了发挥，形成了他的系统的人民性理论。

作为一位年龄不大，却很权威的作家，普希金对文学新人是非常爱护的。别林斯基、丘特切夫、果戈理等人都受到过他的器重和帮助，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对杜罗娃的扶植。杜罗娃是一位退伍的骠骑兵大尉的女儿，1807~1814年女扮男装在军队中服役，曾任骑兵少尉。退伍后，她将自己的经历用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她的弟弟杜罗夫曾在高加索与普希金相识，便写信请求普希金帮助出版。1835年6月16日，普希金在给杜罗夫的信中表示，“乐意为它的出版奔走”，甚至愿意把它买下来。

① 见《普希金的一生》第一卷，“真理”出版社，莫斯科，1988年，第608页。

信中还谈到他对文笔的要求，即“越朴素越好”，“最主要的是：真实、诚挚。事情本身是如此引人入胜，因此无需任何修饰。”1836年3月17日和27日，普希金又致函杜罗夫，重申了前信中的意思，并许诺将在《现代人》第二期发表笔记的一部分。他在编者按中写道：“如今，纳·安·杜罗娃本人揭开了自己的秘密。承她信任，我们将出版她那些有趣的笔记。我们怀着难以形容的同情心读完了这位如此不凡的女子的自白；我们惊讶地看到，那只曾经握过血迹斑斑的枪、骑兵军刀刀柄的纤手也写得一手奔放、生动、热情的文章。”^① 尽管杜罗娃的笔记后来是别人帮助出版的，但普希金的推荐对作者的成长和书的传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情书是普希金书信中最精彩的篇章。卢梭在《新爱洛绮丝》的附录《〈朱莉〉序言或关于小说的谈话》一文中说：“你如何看待书信和书信的文体？给所爱的人写信，就应该用这种文体！因为这时写的已不是信，而是爱的颂歌。”^② 普希金就是如此。他的一封封情书就是一支支爱的颂歌。

普希金一生钟情过不少女子，也写过不少情诗。其中著名的有“巴库尼娜情诗”（25首）、“沃龙佐娃情诗”（14首）、致

① 见《普希金出版的〈纳·安·杜罗娃笔记〉》，张铁夫译，《普希金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 卢梭：《新爱洛绮丝》，李平沅、何三雅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783页。